

Globethics Repository

The logo for Globethics, featuring the word "Globethics" in white sans-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.

我国媒体对经济报道的价值评价存在问题辨析 [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Evaluation of Economic News made by Chinese Media]

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.
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<https://www.globethics.net>. Data and content policy
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<https://repository.globethics.net/pages/policy>.

Item Type	Article
Authors	韦, 春昭
Rights	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/copyright holder
Download date	2026-07-12 06:09:17
Link to Item	http://hdl.handle.net/20.500.12424/182091

韦春昭：我国媒体对经济报道的价值评价存在问题辨析

韦春昭

【内容摘要】本文用作者自己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，剖析我国媒体对经济报道的价值评价的不当和错误，所列现象和例子是从常识开始，逐步深入，直到较深层次。从多个角度分析媒体出现这些不当和错误的多种原因，和其对社会构成的损害。

尽管在理论上，媒体业者对经济报道的采编可以是纯客观的，但在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，也就是说，在采编出来的经济报道里面，总是很难避免渗入对报道对象和其它相关内容的主观评价。这些评价支配着对内容的实际取舍，不同内容的时空分配比例，更不用说用词了，等等。这点，多数高水平的媒体业者都没有异议。媒体由于对社会影响本来就大，加上我国媒体离充分竞争还相距甚远，媒体业者因而拥有的“话语霸权”太大，所以，其经济报道中的价值评价对社会意识影响就更大。我们感到，在我国媒体传播的经济报道中，许多主观评价的价值取向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，并亲眼见到或调查到了不少它的负面作用，许多负面作用是非常之大的。

一、不能推卸主观责任的违背常识

一些媒体，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媒体，多年来，直至现在，在经济报道中，特别喜欢用“任务”一词，如某厂完成全年生产任务，某乡完成冬种任务等，在市场经济一般知识已相当普及的今天，这样的错误，使最一般的普通人也感到十分滑稽好笑。因为任务的内涵是指令性的，我国社会绝大多数人对这词都是这样理解，并且从来没有分歧。我国经过多年的市场改革，现在大多数企业性的经营主体，已没有指令性的经营内容，包括政府在内的几乎所有部门，都不能对其下达任务，它们对经营主体只能是指导，更多是建议。既然如此，何谈任务？

不但企业性经营主体如此，就是对事业单位甚至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情况的报道，用任务一词也还是不妥，比如，说某税务部门完成了全年税收任务。因为尽管税收是强制性的，政府的财税收支计划性、指令性很强，但因为征税必须有合法税源，而税源是由社会各种主体的财富状况决定，其中相当部分是由企业性的经营主体的经营状况决定，这种状况是预先不能决定的，弹性很

大，所以，税收并不能定任务。事实上，许多地方定的也是计划，媒体传播这种信息时，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实现全年税收计划。

不少媒体业者将自己工作中出现这种十分明显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错误，的原因，说成是执行有关管理部门的传播规定，这符合一部分实际。但更多的实际，是和上级规定完全无关，有的甚至是背道而驰。以上面所说的这个内容为例，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某省就专门正式下达过一个文件，要求有关干部，包括媒体业者，认真学习。该文件的内容是，某下级部门向省某领导人用文字汇报畜牧业生产情况，用了任务一词，该领导人退回，要他们改正，他们改后送上来，仍然是任务的意思，该省领导人因而引申出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，于是省党委政府就下达了这样的文件。由于这不过是常识，至少这个省的媒体业者，通过学习后大多数应是懂了，他们这样说，不过是推卸责任的托词。

二、蔑视基本原理，招致规律惩罚

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中，有时是作者直白地告诉读者，但更多是不直接讲出，只是在全书内容中，自始至终都体现着这样的思想：经济工作，能说明其是否正确的，只能是最终成效，对于还不是成效的思想、计划、投入、工作过程等等，都统统不是证明其正确的证据。并且，许多工作计划，经无数专家、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、员工等反复推敲，感到它的优点很多，很美，缺点却都被穷尽和弥补了。然而，实施后，它还是暴露出了一个缺陷，就是在实际中行不通，或者是比这好一点，也勉强行得通，但出现了许多原来想不到的问题。民间商界有句名言，“（帐面上的）钱进了（自己的）口袋才是（自己的）钱”也是这一意思。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，也是人类思维和经济的关系之规律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国许多地方大种果树，不少媒体在报道时，几乎是不加任何思考地倾力歌颂种果树的事主，包括地方政府部门，大农业开发者，农民等，并肯定地描绘着美好前景，种下去的水果品种的产量，社会、财政、果农收入都将增加多少等。尽管现在面对了尴尬的历史判决，有的媒体业者说他当时并没有歌颂，只是报道，当然，当时他心里真是怎样想，外人无从知道，但其用词色彩，内容选择等，至少使受众认为他们就是一味歌颂。在媒体和事主的互动下，大量的资本投下去了，大量的树苗种下去了，在以后的若干年里，还继续追加大量成本护理果树。到现在，足以检验真理的若干年过去了，效果是，数量不少的果树收益很低，有的甚至没有收益，大量的成本打了水漂。更重要的是，浪费了宝贵的机会成本、时间成本。

原来，到目前为止，种水果还必须很讲究品种对具体自然条件的对应性。比如，在广西、云南、福建等地，出产八角的地方均有一些共同的东西，比如，山有一定的高度，夏天不太热，每天日

照时间不太长等，这似乎是到目前为止，八角树能成活，特别是能产出优质八角果的自然条件，虽然目前人们，包括这一领域的专家，还没敢肯定是这样，但无数地方的实际就是如此。一些人不知道有这一前提，或者是知道，但却为了别的什么原因，比如政绩，或应付眼前任务，而不顾损失，在不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的地方也大种八角。结果，种出来的八角树就是不生八角果，或者是虽然生但产量低，更重要的是品质差，顾客不肯买，人们只好大片大片地将其砍掉。田七、酸梅等水果，再扩大去是药材，更扩大去是大量农产品，都存在这种情况，当然轻重程度不同。

媒体业者在报道这类内容时，对其的价值评价若能遵循科学的基本原理，那报道的形态和对社会的影响就大大不同。比如，会提醒人们注意，果业至今在许多领域还是“人算不如天算”的实际，提醒人们注意理论上再好的计划也不是结果。至少也只是客观地陈述某地有在种八角这回事，尽量不作评价，由受众和有关部门自己判别其内涵。这样，媒体就可以真的是对社会有功，或者是虽不有功，但也沒有大过失，或者过失不如现在大。媒体业者必须牢记，大自然容不得任何蔑视，社会发展规律也容不得任何蔑视，对经济报道的价值评价，必须如履薄冰般小心小心再小心，或然是一回事，其不但不是实然，甚至很多连必然也不是。

三、媒体默许甚至间接支持不遵守商业规则

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是客观的东西，一些媒体业者尚不尊重。商业规则是人制定的，是主观的东西，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一些媒体业者就更不尊重了，他们对不少经济报道的价值评价体现了这一点。

某地对外招人承包地方国有化工厂。一广东商人来包，一段时间后，到银行提取一大笔款跑了。他提取现金的手续，银行付给他的程序，全部符合银行的规定。某报在报道这件事时，破口大骂这商人是非法之徒，说银行不该让那商人提款，因为损失涉及到了那地方的利益，那地方的群众，甚至干部，也跟着大骂银行。在具体这件事的实体正义上，该报这样的倾向或许是对的，但在对待商业规则上，却错了。

因为，尽管规则不一定是真理，只不过是保证大家都按照一定规定行事的東西，但尊重规则，却一点也不因规则不一定是真理就不重要。现在世界已大部分联为一体，成千上万的经济经营主体要互相打交道，如果没有规则，以及有规则却可以随意不遵守，那世界经济将会混乱成什么样子，是不是马上使人类贸易水平倒退几千年？就这件事来说，假如银行知道该商人来提款是有不轨目的，银行就违反经营规则而不给他，在这件事上也许是保护了该地方的利益，但由于银行对规则随意践踏，许多本来并没有不轨思想的商人却不敢来投资了，或者撤资了。因为以后他们去

银行提款时，即使完全没有什么错误心思，但银行也可能不给他们钱，甚至银行会以这为手段，故意不给提款，迫使他们给好处等。

所以，通过践踏规则来维护个别实体正义，所得来的好处，远比带来的坏处少。我们随便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支持这一说法。

人们只要纵览一下各地媒体，就不难发现，越是落后的地区，媒体对经济报道的价值评价，这种忽视、蔑视、践踏商业规则的现象越严重。还以承包为例，在广东珠三角，上海浦东等地，只要原来规定承包者应得什么利益，结果承包者就得什么利益的比率较高，即使利益很大，甚至不合理也如此，而在落后地区，比如某些西部省份的山区县，承包者若是得利益多，在很多地方，很多时候，麻烦就来了。发包者，甚至连那些拐七八道弯才有联系的有关人员，找理由了，什么文字虽这样写，但原来不是这样说啦，那个方面的工作，若没有我们份外帮你你做不好啦，等等。总之，是千方百计想克扣人家的利益。而那些地方的媒体，许多是极少谴责这种思想行为，能保持沉默不帮“自己人”就不错了。

对待成文的商业规则尚且如此，对待不成文的商业惯例就更不用说了。所谓商业惯例，许多是指虽不成文，但已约定俗成，大家都遵守，以之来处理人际商业关系的东西。在经济活动中，遵守商业惯例，有时比遵守成文的规则更重要。因为许多商业惯例不成文，甚至发生商业关系的双方或多方，事先并不明确说“按商业惯例办事”，而只是一种默契，当事人认为对方不需要申明，认为大家都会讲信用，所以许多讲出口，写成文字的手续都省了。因此，在很多情况下，能保证对方遵守商业惯例的力量，常常只是信用，其它力量，比如法律，不起作用，因为法律要求的证据要素，在商业惯例发生的领域，因如上所述而不齐全。

比如，某大水泥厂讲谁帮推销水泥得多少比例的提成。玉林的王某成功推销了七次，该厂方每次都给提成给他，到第八次，王某推销的数额很大，厂长心疼了，舍不得给人家了，讲没承诺过。事实上，人家帮推销东西有提成，这是商业惯例，而且厂方已给过七次，说明厂方承认惯例，厂长这是耍赖。王某去找报社，报社从社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“劝”王某，说您不是已经得过七次了吗，人取钱应知足嘛，算了吧，工厂也很难哩。令王某哭笑不得，上法院？没证据，怎么告得赢？

许多媒体业者不知道遵守商业规则的真正的重要性，或者知道却不肯克服自己的狭隘。一个地方落后一定有必然原因，而这种践踏商业规则的行为，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其导致人们办事的效率低下。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，人们的思想又深受社会意识的影响和制约，媒体业者这种价值评价导向，不但不利于改造，甚至还强化这种社会意识。

四、不顾整体效益的成绩观和社会意识互相强化

多年来，不少地方经常出现一种现象，就是刻意创造一种于单项来说，好象是不错的成绩，但从整体上看，不但算不上成绩，有的还是不好的，甚至是危害很大的后果。而不少媒体也是不管什么整体效益，总只是大版大版地盛赞表面的工作成绩，并且用一串串数字说明，比如，财政投入多少，多少干部下乡，出动了多少人，做了多少工等等。当然，有些地方媒体就在那些官员的领导之下，这样的报道是奉命行事，但我们这里不是说这种情况，而是指媒体业者可以自由行使自己意志的情况，比如，省媒体对县市的报道，跨省报道，全国性媒体对地方的报道等。

在媒体这种价值评价的长期大量影响下，据我们调查，许多地方的国民，包括不少知识分子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这样评价官员的理念，比如，某官员在某地某部门做出了一件比较显赫的事，社会上许多人就说该官员有能力。这样的社会意识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行为，互为循环。

这种意识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而广泛的。比如，地处北方的某地城市美化得较好，在南方的另一个地方组织所属的市县去参观，回来后，许多市县为了谋求城市美化的政绩，就全按照那北方城市的样子改造市容，有的将机关院子、城市广场上长了几十年的大树砍掉，种上草皮，鲜花，将旧房子拆掉，建外边是玻璃墙的新房子。表面上是美了，但是，大树没有了，大气质量恶化了，大树从来不需要人浇水，草皮需要人浇水，而一些地方因为电不多，水不多，自来水并不充裕。倒掉旧房子建成玻璃墙的新房子，浪费一大笔钱不用说，玻璃墙通风不便，象非典之类的传染病一旦流行，就会吃大亏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近年来，我国学术界，以及不少官员，关于建立一种全面评价政绩体系的呼声日高。也就是说，评价一个官员或地方政府的政绩，要全面地看，将必要的社会进步和负进步因素分成一个个指标，然后将这些指标的数据综合，得出指数，以这一指数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尺。这些因素尽量囊括完社会项目，如，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文化、教育、社会治安、计划生育、环境保护等等，由于这些指标互相制肘，即这项数据高了，那项数据就低了，官员于是就不轻易为求得一项工作突出，而损害其它工作。

其实，媒体对政绩的评价是可以，甚至比较容易做到公正的。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媒体只是经济报道内容的旁观者，由于旁观者的利益往往和报道涉及的对象无关，所以就容易做到不偏私。还进一步，如果媒体只求报道客观，以树立自己的科学美誉，使受众信赖媒体，更多地接受媒体，提高受众数量，得到更多广告收入，那对报道内容的价值评价也就更接近公正。

为使人们对这一机理更加明白，再以我们的另一个调查来辅助说明：一些地方的城建规划，请同济大学等外地专家做，往往比较科学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外地城建专家的个人利益和城建实施后所产生的地产、生意等无关，如果说，他们做城建规划也存在个人利益的话，那也只是偏重于专家们必须按科学要求做好，树立自己的科学美誉，使以后又有更多的地方请自己去规划，挣得更多酬金。但城建规划确定后，一些地方官员常常以这种那种理由改掉，牺牲科学性，这边建一个小区，那边建一个市场，其真正的原因在于，官员可以通过开发小区和市场弄到一间房子，捞十万八万。

媒体对经济报道内容的价值评价要做到科学，不仅应该置身于小范围的报道涉及对象之外，甚至还应能跳出更大的范围，从更超然更高的角度看问题。比如，近年来，西方国家常常对我国商品进行反倾销，常常以农药超标等理由禁止进口我国的产品。一些媒体经常是从我们利益角度看问题，认为人家是胳膊拐入，变相设置贸易壁垒，保护自己的市场。当然，这也符合相当部分的实际。但只要我们仔细了解人家的国情，了解人家对待自己国内企业产品的态度，以及尽可能多的其它相关情况，就会发现，人家的做法其实很有道理。比如倾销，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，我国许多企业职工工资占产品卖价的比例，同许多国家比较，是相当低的，压低该付的劳动力成本将产品的卖价压得很低，难道这不是不正当竞争？不是倾销？

再看日本以我国农产品农药含量超标，不准进口的例子。日本是非常珍视公民健康的国家，饮食非常讲科学，生活非常讲质量，城市非常整洁，日本国民大都能自觉遵守科学卫生等准则，政府对公民、社会群体对个人，这方面的要求也非常严格。他们自己都这样要求自己，我们农民的农药含量超标，人家不进口，这是人家戴有色眼镜看问题，还是我们戴有色眼镜看人家？据我们调查，我国公民素质普遍较低，读书看报少，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很少，想问题没有理性，对人家产生怨气是很自然的，媒体业者不应只具有一般人的水平，跟人们一起瞎起哄，而应有更高的知识，更理性的态度，通过对报道的价值评价，引导人们科学公正地对待这类问题。

五、从对技术革新的鉴荐看媒体业者思想视野的重要性

某瓷器产地一直用薪柴烧制瓷器，是封山育林的最大障碍。有个业主试用煤烧，烧出来的瓷器瓷器质量合格。某报总编亲自出马，采写此事，以很醒目的标题向社会报喜，弄得一时间人们欢欣鼓舞。但懂经济的人都报以冷笑。因为该业主用煤烧成瓷器，不管有多么大的好处，但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成本高出了瓷器的售价，这就意味着生产越多，倒贴的本钱越多。当然，有些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的产品，有时是必须贴本生产的，但这种民间土瓷远远不属于这类产品。所以，这种成本核算过不了关的技术革新，还不应向社会推广。懂得焙烧技术的人还嘲笑这位总

编不懂焙烧常识，即烧制瓷器成功需要的是热量，而不是什么燃料种类，所以，用煤烧并不是什么新鲜想法，主要问题是成本，如果不计成本，用电、汽油烧也会成功，并且质量会更好。

如果这位总编有相当知识，因而有足够视野，又有社会责任感的话，那他对这一经济行为的价值评价大致应该是，可以肯定这种革新的方向，但同时提醒人们注意成本过高的问题，引导人们在改进技术，降低成本上下功夫。若能更进一步，还可以告诉受众，随着陶瓷生产技术的进步，一些大型陶瓷生产企业正在较快地扩大规模，降低成本。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陶瓷质量档次要求也不断提高，以后大企业的产品将更多地占有市场分额，本地这种民间作坊烧制的土瓷，将因缺乏竞争力会逐步淘汰，所以陶瓷业主应有所准备，如技术水平上不去，就退出这一行业，及早转行，这对社会没坏处，对自己，对本地林业都有好处。后来陶瓷业的发展果然是这样。

也许有人认为，媒体对这样的内容价值评价不正确问题不大，不就是用煤烧不划算吗？那些业主一算成本就不会采用的。是的，这一实例对社会危害是不太大，但我们用这个例子，也只不过是为了方便把看法讲得更清楚而已。在社会实际和媒体传播的内容里，原理和这相当，对社会重要得多、危害极大的情况并不罕见。

比如，某县开采稀有金属矿，为了短期得到更多收入，只管出矿，不管社会代价和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成本，表面上发展很快，财政收入迅速飚升到全省前十名，县城从过去只有四间瓦屋，其余均为茅草屋，迅速变为到处世界各地风格的楼房林立，成为全省县市级城建榜样。媒体都是歌颂这个县这样好那样好，对采矿造成的大面积严重污染很少报道，更很少批评，对大量矿工安全得不到保障也视而不见，最后酿成了大祸，矿山发生了恶性事故，矿工大量遇难，沿江几个县由于受污染程度太深，大片土地以后几十年都无法耕种。

六、该支持的改革，媒体评价不当

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，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，依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，不断进行体制变革，管理创新，是普遍常态。而且，由于我国具体国情特殊，比如不象西方发达国家，是在封建社会中自然产生资本主义萌芽，而后资本主义一直在私有体制中逐步发展，西方的许多经济学经典理论和管理规则，都是产生于这一社会现实，为这一现实服务。而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很薄弱的时候，实行计划经济，又再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转轨，所有西方经济学的现成理论和管理规则，并不完全能指导我国某一改革时段的现实。

比如，在西方市场经济经典理论中，政府必须超然于微观企业竞争之外，在市场竞争中只能做裁

判者、守夜人、服务者的角色，这没错。但问题是，我国不用说改革开放初期，就是现在，许多乡镇企业，国有企业，改制后政府参股的企业，在决策上，设备资金上，人事上，信息资源上等，都有政府在其间，媒体对经济的报道显然不能离开这一实际。

媒体对于这一实际的价值评价常常不正确。

有的媒体是宁支持守旧不支持改革。我国改革的过程是探索的过程，许多改革不以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谁优谁劣为思想前提，而是哪种有利于发展经济就采用哪种。在这样的框架下，地方政府就有了较大的回旋空间，在地方与地方之间互相竞争吸引资本，占领市场，占有资源的情况下，许多地方为了提高本地发展水平，增加财政收入，和官员的政绩，就以实用主义的态度，处理许多体制问题。比如，默认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，但给私营经济带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有的媒体对其报道时作出否定的价值评价，有的甚至用“假公济私”这样的语言，这里不是指那种真是假公济私的情况。但后来的改革进程证明，当年这些地方的创造没有错，哪个地方这种创造越充分，由于占了竞争先机，现在经济越发达。

媒体为什么作出那样的价值评价呢，有很多原因，比如，在潜意识中，由于其享受着计划经济给他的好处，所以不知不觉地对大锅饭情有独钟，对私有制持排斥态度，对私营业主发财心理不平衡等。但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多年来，在事实上，支持守旧个人利益很少受损失，而支持改革则有风险，这就使得许多媒体业者明明在心里知道改革是好的，但在作价值评价时也守旧，所谓宁左勿右，的个人利益原因。

七、媒体对某些改革作积极评价，但却是错误的

一些地方为吸引外资，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以及其它措施。一些媒体对这种做法予以积极的评价。我们这里说的也仍然是媒体业者完全是个人意志使然的真诚心态，不是指在外力下而不得不按外力要求做的情况。实际上，许多地方出台的这种政策或做法，许多是不合适的，有的还是违法的。比如，免税，按管理科学和世界各国的做法，以及我国的规定，并不是哪级政府都可以免税的，地方政府随便减免税收，会形成恶性的不正当竞争，破坏市场规则，其它的一些做法错误的原理和此大致相同。就算是一些类似措施是在地方政府权限之内，从长远来说，整体来说，效果也不见得好。比如。某地政府为吸引外资，无偿给外资划拨土地，媒体称赞说，这是用地种出金子。

实际上，或许就个例和短期而言，这块地确实种出了金子，但从整体和长期来看，真正的外商反而不敢来。有个外商讲得好，你正正规规卖地给我，我敢投资，因为以后地是我的，出事我可

依法走天下。你送地给我，特别是随随便便地白送，我不敢投资，因为这说明你做事随便，人治色彩很浓，有一天你也可能随随便便就要回去，还有，旁边的人会认为我是发不义之财，也会心安理得地来损害我的利益。

媒体对这种做法予以都是正面的评价，会使社会形成做事随便，不讲法律，不讲兼顾各方利益的意识，这非常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。纵观世界上的发达国家，都是办事严谨，厉行法治，政府和官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办事，这是它们发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，反过来，象这样事情办得随随便便的国家，不见有哪个是发达的。

八、大方向虽然是虚幻天使，但魔鬼在细节里

媒体对改革的评价不当不但在方向上，更多的还是在细节里，即媒体褒扬的一些东西，在大方向上并没有错，但通不过细节的检验。1995年，我国工商、建设等大银行转向商业化后，由于普通农户贷款金额少，经营地离银行营业地点远，银行对他们审查、管理等成本太高，不再愿贷款给农民。针对农民这一困难，一些地方政府实行一种做法，由乡镇政府募集社会，主要是农民，的闲散资金，然后贷给需要小额贷款一般农户，特别是困难农户。不少媒体带歌颂倾向地报道，许多还不只是报道，甚至是宣传，这一做法。

应该说，这一构想在理论上还是不错的。但如果媒体业者注意到“魔鬼在细节中”这一西方警句，仔细推敲一下每一环的工作细节，就会发现潜在问题很多。比如，乡镇政府得到这些钱后，挪作它用怎么办？若不用说出现死帐，就是出现呆帐，如何还得本金和利息给集资者？管理这些资金的乡镇干部不廉洁奉公怎么办？等等。果然，这种做法实施不到三年，结局就不可收拾了。不少乡镇以高息许诺，募集到了农民几千万元钱后，没有按原先设想办。只贷一部分给一般农户，而暗中大笔贷给外地大生意人，使得相当部分必然地成了死帐。死帐积累到一定数量后，就不再有钱及时兑现给来领款的集资者，集资者就出现恐慌而挤兑，许多乡镇干部和有关系的人暗中按高息领了自己那部分，最后领不到钱的，只能是无权无势的一般农民，产生社会问题。

事实证明，媒体颂扬这一制度创新是太早了，太草率了。农民们说，如果不是报纸电视台说得那么好，我们也许是不会上当的。媒体业者的正确做法应该是，在报道这一制度创新的同时，多质疑实施细节。金融管理和监控本身是很不容易的，若容易，世界各国设那么多的大中专学校金融专业干什么，而做这件事的大部分乡镇，连一个正规金融专业的中专生也没有。

九、许多深层次的错误源于媒体业者缺乏相应知识

在经济运行中，常常出现一些和普通情况比较特别新鲜、领先的内容，为了在学术上便于表述、交流，我们也把它归入“创新”和“改革”的范畴。媒体是以传播新近发生的事情为主要使命的，当然要传播这些内容。这些内容由于比较前卫，所以常常会引起社会跟进，媒体报道时所作的价值评价，常常会起到引导社会潮流的作用。

有个村许多农民将房子改建成二层别墅型的小楼房，对主要道路进行水泥硬化，建了沼气池，整个村子确实显得比过去美丽、卫生多了。不少媒体对其进行大量报道，赞美该村农民，颂扬这种做法。孤立地看，许多人以这件事是农民自愿做为前提，都认为是正确的。但若将这件事同大量的相关因素联系起来看，许多经济专家都认为，媒体颂扬这种做法，有意无意地引导农民也这样做是错了。

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需要看，那个村的土地不太多，多数农民应该移民城市，那个村的农民一人平均几亩地，再加上远离物资集散中心，生产、生活成本都太高，只有大部分移居城市，留下少数人经营这些土地，才能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、集约化，发达国家走向发达的历史无一不是如此。这样，媒体引导广大农民在农村花巨资建别墅，显然对经济发展的必需趋势起阻碍作用。农民建别墅后，就没有资金再到城市买房，或者纵然有资金，也舍不得丢掉辛辛苦苦建成的这些别墅，再到城里买房。况且大多数地方的实际，农民的收入还是相当有限的。以巨资建这种别墅，生产生活资金分配是否得当，是否是图虚荣而互相攀比，有的恐怕还是某些部门为了虚名压农民，或违规斥资支持少部分农民这样做，等等。媒体还应该深入调查，仔细考究。

人们要能正确地创新和改革，媒体要能正确地歌颂创新和改革，是并不容易的。因为决不是创新就是好的。“四人帮”时曾经一平二调，割资本主义尾巴，取消高考制度等，难道不是创新和改革？历史证明其正确吗？纵观人类历史，只有那些真正建立在人类成功经验、科学知识、文明基础上的创新和改革，常常才是正确的，而离开总结研究人类的经验教训，光凭着热情，空想出来的创新和改革，西方将其称为“没有根子的思考”，常常是离奇古怪的同义词，这种创新和改革的成功机率不但很低，而且常常反而对科学和文明构成反动，对社会构成伤害，有的伤害还十分严重，比如上述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创新和改革等。

所以，媒体业者要想能正确地评价创新和改革，正确地评价经济报道所涉及的经济现象，乃至正确地评价所有其它报道的涉及对象，给社会以正确的价值导向，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，了解尽可能多的人类历史经验教训才行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1、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1993年11月17日《人民日报》
- 2、李会滨著，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几个问题》，《社会主义研究》，1995年第1期
- 3、包心鉴著，《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》，《政治学研究》，1996年第1期
- 4、周鸿书著，《新闻伦理学论纲》，新华出版社，1995年第1版
- 5、王纬主编，《镜头里的“第四势力”》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，1999年6月第1版
- 6、宋则行、樊亢主编，《世界经济史》，经济科学出版社，1993年8月第1版
- 7、（美）托达罗著，《经济发展》，中国经济出版社，1999年1月第1版
- 8、晏智杰主编，《西方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》，中国计划出版社，1997年4月第1版
- 9、（日）速水佑次郎、（美）弗农·拉坦著，《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0年第1版
- 10、本书编写组编，《他山之石——国外欠发达地区开发启示》，中国林业出版社，2000年5月第1版
- 11、陈建军著，《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——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》，2000年8月第1版
- 12、罗昌宏主编，《中国现代科技管理》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，1988年2月第1版

作者电子信箱：weichunzhao53@sina.com

欢迎转载，请注明：转载自《[中国研究](http://www.nowis.com/c/)》（<http://www.nowis.com/c/>）
